

符号的模式化系统与符号域

——洛特曼符号学思想研究*

王铭玉

摘要 洛特曼及其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一直备受世界符号学界的关注,该学派基于对俄罗斯文学、文化、历史的独特观察而形成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洛特曼一生勤于治学,思想丰富,尤其是关于符号的模式化系统思想和符号域思想对语言和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符号体系可分第一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模式化系统,二者同源、同构,却互有区别,语言和文化现象是二者的代表,彼此互为方法、互相影响,可以促进语言文化学的发展。符号域是一种符号学视野下的文化观,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和载体,其典型特征是在“动态平衡”中体现文化要素的性质,它是研究语言文化学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 洛特曼 模式化系统 符号域

The Modeling System of Symbols and Semiosphere

— A Study of Lotman's Semiotics

Wang Mingyu

Abstract Lotman and the Moscow-Tartu School have always been the academic focus of world semiotics. The Moscow-Tartu School enjoys a well-established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by its theory of cultural semiotics which is built upon the extraordinary observ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history. As a scholar, Lotman worked very hard all his life and had plenty of great ideas; particularly, his modeling system of symbols and his idea of semiosphere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Lotman, symbolog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primary and the 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s. The two systems are homologous and isomorphic, although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They are represented by the phenomena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are abl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culturology when they offer methodologies to each other and exert influences upon each other. Semiosphere is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 in semiotics. It provides space and vehicle for the production, activity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ymbo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nature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a dynamic equilibrium. Above all it offers an effective way and method to study linguistic culturology.

Keywords Lotman; modeling system of symbols; semiosphere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现代语言符号学》(06JJD740009)的阶段性成果。

苏联是现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那里的符号学研究不仅开展得比较普遍,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独创性——它是俄罗斯传统的人文精神与现代科学思想的完美结合。洛特曼则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由他参与创建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以及主要由他对俄罗斯文学、文化、历史的独特观察而形成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尤里·洛特曼(Лотман, Ю. М, 1922—1993)是出色的文艺学家、文化学家、艺术理论家和符号学家。1922年,洛特曼出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知名律师,母亲是医生。他于1939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语文学系学习苏联文学,其间参加了卫国战争并获得两枚勋章、七枚奖章。战后他重返校园继续学业。1950年毕业时,正逢“世界主义”运动的高潮期,身为犹太人的洛特曼只得离开列宁格勒,在遥远的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塔尔图大学谋得一份教职,在那里度过了一生。大学期间他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毕业后一年,他凭这篇论文获得了副博士学位。1961年,洛特曼在列宁格勒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文学理论专业当时最年轻的语文学博士。1962年,前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和控制论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召开了“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研讨会”,正式讨论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问题。其后不久,对此同样产生了极大兴趣的洛特曼便亲赴莫斯科,着手建立了莫斯科和塔尔图之间的学术合作。两地的学者在研究内容上虽各有偏重,但同时又在密切的学术合作中相互补充,各自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他们共同举办了五次暑期学术研讨会(1964—1974),出版了25期《符号学系统丛书》(1964—1992),最终发展成为一支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的学术团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洛特曼遂成为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洛特曼一生勤于治学,著述达800多种,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文化学、文艺理论和符号学方面的经典之作,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论结构概念在语言学 and 文学中的区别》(1963)是主张把语文学与精密科学结合起来的第一批著作之一;《文学文本的结构》(1970)提出了文学代码的多样性、文本的分级建构、文本的组合与聚合、布局、情节、视点、文本和文本外结构的类型学等重要理论问题。《思维世界》(1990年英文版,1999年俄文版)作为他符号研究的代表作,提出“文本自身就是一个意义生成的机制”的观点。《文化与爆发》(1992,洛特曼生前最后一部书)讨论了文化发展的方式问题,并探讨了俄罗斯文化史动荡多变的原因^{[1](22-24)}。

作为一名世界级的著名学者,他生前拥有不少荣誉和头衔——他曾是世界符号协会的副主席、不列颠科学院院士、挪威和瑞典科学院正式成员、世界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普希金奖获得者,去世的前一年(1992)还当选为爱沙尼亚科学院院士。应该说,洛特曼涉足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俄罗斯符号学界标志性、总结性的人物,他将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精神、艺术等方面的现象和内容均纳入其考察的范围,做了一些深入的、别具一格的研究,给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下面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角度出发,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洛特曼关于符号的模式化系统思想和符号域思想。

一、符号的模式系统

大千世界由三大要素构成,它们分别是人、客观世界和符号。符号学认为,人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是通过符号建立起来的,即人通过符号认识世界。符号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也是认知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条件。符号体系是人类创造的现实世界的替代物,是再现我们周围世界的模式,以此来表达人们对周围世界

的感受和认识,所以说,符号体系被称为模式化体系(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

洛特曼把“语言”分为三种:(1)自然语言,如英语、俄语、汉语等语言;(2)人工语言,如科学语言以及路标等常规信号语言;(3)第二语言(第二模式系统)^{[2](362)}。自然语言是对生活的第一次模式化,是第一模式化系统。它不仅是最早的,还是最强有力的人类交际的体系,它是人类描绘世界的语言图景,人类用语言提供的模式了解和表现世界。因此,在所有符号系统中,历史形成的各民族的语言被称为第一模式化系统,而在原生自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模仿语言的结构(组合轴和聚合轴)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风俗、仪式、神话、法令、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以及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各种门类及各种科学,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被称为第二模式化系统。

研究表明,洛特曼模式化系统理论有其思想渊源。首先,它是以语言学为原型和基础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传统的影响。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学是一个层级符号系统,语言是所有符号系统中最典型的,其他任何符号系统都可以通过语言也必须通过自然语言对其进行解释。洛特曼正是根据语言文本来对历史文化文本进行重构,各种以语言结构为基础的非语言的文化系统可以归属于符号的第二模式化系统。再则,模式化系统理论的提出受到了前辈巴赫金的影响。巴赫金曾指出“整个文化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语言现象”^{[3](638)}。不难理解,第二模式化系统建立在第一模式系统之上,因此具有了自然语言组织结构信息以外的附加意义即文化价值。但这里并不是说只把自然语言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绘画、音乐、电影等其他形式的非文字文本也包括在第二模式系统当中,两种模式系统划分的依据是它们组织结构的差异。

第一性和第二性模式化体系的区分,有利于我们更为科学系统地研究文化符号。我

们知道,文化语言和自然语言均是符号体系,因此它们有相通的地方,即二者同源、同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用研究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语言,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深入探讨文化语言现象的结构及其内部的规律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清醒地意识到,文化语言和自然语言分属不同的模式化体系,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归为异质现象。首先,自然语言是第一性的,它是一种工具,是所有文化语言的基础;而文化语言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比自然语言更高级、结构更复杂的符号系统。再则,自然语言基本上是单语的,而文化语言是多语的,文化内部不同语言符号的互动成为研究文化的关键。

鉴于两个模式化系统的区别,我们不能把二者混淆对待,否则就会把文化语言变成机械的符号,文化的意义就被阉割了。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可以把文化语言看作是服从于普遍结构规则的符号系统,那些在第一模式系统中,或者说在普通符号学中富有成效的科学范畴,例如语言和言语、组合和聚合、共时和历时、内部和外部、文本和结构等可以运用于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文化研究的重心应向第二模式化系统倾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第二模式系统制约着文化信息的传递。文化语言现象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则体系,区别于自然语言,主要归属第二模式系统,其功能是传递信息,传递一种人与社会的存在具有价值的信息,传递一种体现人们价值判断、体现人生经验、原则、规范的信息(比如神话、宗教、音乐、绘画、文学、政治等)。二是第二模式系统影响着对语言文化信息的接收。第二模式系统具有“先验性”,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神话的、艺术的,它们都是依靠自身的模式使一种“现实”出现,比如,诗歌的韵律模式将自然的字、词、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去,并通过这种方式再现客观世界。

二、符号域

“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术语源自维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的“生物域”(биосфера)概念,由洛特曼于1984年正式提出。所谓符号域,指符号存在和运作的空间。在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中,“符号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注重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构成了一种符号论的文化观。洛特曼认为,符号域与生物域具有共同的比拟性,二者都有空间的概念和它们所包含的内部各个系统的存在、发展条件。就文化研究而言,符号域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背景。换言之,它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思想意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符号域思想的核心是空间概念,它来自于拓扑学(topology)。拓扑学术语由近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提出,该门学问属几何学范畴。它的基本思想是拓扑等价,即研究有形的物体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换言之,拓扑学是一门只研究图形各部分位置的相对次序,而不考虑它们尺寸大小(由于变形引起的)的新的几何学。拓扑学也被人们称作橡皮膜上的几何学,变与不变的双重性质是其性质特征。所谓“变”,是指随着橡皮膜的拉动,图形的长度、曲直、面积等外在特征都将发生变化;所谓不变,是指橡皮膜上图形的内在性质保持不变,例如点变化后仍然是点,线变化后依旧是线,相交的图形绝不因橡皮的拉伸和弯曲而变得不相交。

洛特曼之所以倚重拓扑学,“正是看到了拓扑学对解释文化表层各异的功能和空间中的深层同构作用,也就是文化文本中蕴含的恒量。我们认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在思想精神上的相通点,就是整体文化的恒量,而文化语言及系统的特性,就是拓扑变形的结

果”^{[4](60)}。总而言之,符号域引用拓扑学的是“变换下的不变”概念,追求的是文化研究中的“动态平衡”目的。

首先来看“动态”。时间和空间是一切事物存在的两大坐标和参照系,洛特曼也正是运用拓扑学的原理,把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普适性的概念作为符号域的重要坐标。用时间来衡量文化,会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分,使得文化具有了历时继承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比如,在对符号域的基本单位——文化文本的时间性考察中,洛特曼提出了两种认知思维模式:神话思维和历史思维^{[5](152-156)}。神话思维究其本质属于循环思维观。当时,由于缺乏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人们往往根据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自然界的体验去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进行简单的联想和推理。人类可以经历从出生、成熟到衰亡过程,植物可以由发芽、成长到死亡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关于人的生命周而复始的神话,佛教中有轮回、转世的说法相信和对自然的体悟是分不开的。这样一来,神话思维把时间看作是一个无头无尾的连环,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神话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理解许多既有的文化现象,但其封闭、循环的思想又失去了对时间的区分功能。因此,洛特曼在关注神话思维的同时,充分重视历史思维的重要作用。他知道,只有当把时间看作是线性的、非循环的,看作是不可倒转的这一概念在社会意识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才能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完全明确地区分开来。所以,文化思维还必须要有理性的一面,文化文本中的事件的发生更要按时间的顺序来考察,从思维的角度来认识。

与横向时间轴相交叉,符号域内还存在纵向空间轴,它包括内部空间、外部空间和符号域各个亚结构之间的边界。洛特曼把符号域视为文化存在的空间,文化文本的信息在此空间中传递和翻译,拓扑学中的区域、边界、位移等可以在文化研究中得到演绎。第

一,文化是由文本符号构成的,但这些文化文本符号决不是杂乱无章堆积在一起,而是以有序的多层级性互动共存在符号域内。为了能够站在整体的角度全面地研究文化,应该找到一种对文化模式统一描写的元语言,用于揭示诸多表面各异的功能和空间形态下掩盖着的一致性和集合性。而适合这一主旨的元语言就是对图形和轨迹拓扑性质的描述结构和区域概念(符号域内的每一条道路在区域内部都是相“连通”的)。第二,符号域按照拓扑学理论可分为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中心区域就是一个互相连通的区域,它是最发达、结构最严谨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是符号域赖以存在的基础;边缘区域就是远离中心的区域,其划分依据是不可连通性。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界限就是边界。边界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既是固定的,又是变迁的、不对称的。就文化而言,位于中心区域的是主流文化,是原型文化,但中心无法覆盖全部,我们还不能忽视边缘的区域,摒弃非主流文化,因为符号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领域,随着中心与边缘的互动,边缘文本的地位才日益凸显,最终被人们重新发现和认可。第三,众多文化文本、文化语言共同构成了文化符号系统,构成民族文化的整体,符号域就是这个文化符号错综交织的空间模式。在其中,文化文本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不断地运动,产生位移,其直接的结果和价值在于:有序结构对无序结构的侵入和无序结构对有序结构的侵蚀。如果按洛特曼的观点,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文化不是静止的均匀平衡机制,而是二分结构,即有序的结构对无序的结构侵入,同样,无序的结构也在侵蚀有序的结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某一种趋势可能占据上风。文化域中来自外部的文本增加,有时是文化发展有力的刺激因素”^{[6](506)}。

接下来再看“平衡”。作为结构主义者,洛特曼在对文化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化共相和恒量的分析,提出了文化的恒量文本模

式,探讨文化符号在拓扑变形的情况下保持文化统一和文化平衡的问题,我们对此再做延展性探索。第一,从文化的生成来看,文化的平衡与生态的平衡相类似。《国语·郑语》里有过这样的论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显然,这里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对我们的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只有和谐与多样的统一,才能造成万物的繁荣、文化的兴盛,而“以同裨同”,千篇一律,只会造成事物的凋敝、窒息文化生机。和谐的生成,通过“以他平他”的相生相克、互相补充才能求得平衡,使得各种文化相互协调并进。第二,文化的平衡应关注域间平衡。贾载明在《人类文化的分类》一文里,重点讨论了“文化性质分类法”,从文化反映的事物的性质出发,将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分为伦理道德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文化、思想哲学文化、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文化^①。就六大文化领域而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是迥异的,这一点可能会深深地制约着文化的研究。比如,几千年来,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思想哲学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历史文化发展较好,而有些文化却不及西方文化先进和优秀,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文化和管理文化这两大类。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要注意文化领域间的协调研究。人类创造文化是存在时间上的先与后的,但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明是可以相互促进的。第三,就语言文化而言,异质文化的平衡构成主线。文化的价值之一就是它使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民族的人得以沟通,使异质文化相互和谐平衡。众所周知,我们所归属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我们所拥有的中华文化,同样也吸收了多民族异质文

^① 见《博客中国》,“谈各类文化的平衡协调发展”,2007-08-12。

化的成果,比如,如果没有其他少数民族先进文化的充实以及佛教的传入,恐怕就难有唐代的舞蹈、诗歌、绘画和书法的辉煌。所以,提倡文化的复数主义对文化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因为文化是与环境、时代和种族相关联的,文化受其所处的环境的制约,要不断地和周围的环境相互调节而生存,还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第四,跨文化交际应是语言文化研究的热点。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意识的相互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平衡问题不可忽视。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另一个文化,另一方面,不能忘记本土文化,因为,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是目前语言文化研究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要知道,本土文化在多元性的语境和视域下,更能保存、凸显和张扬,要真正做到“跨文化生存”,成为“跨文化的人”,它要求学者拥有超乎自身文化之外的眼光,对本土文化再阐释或价值重估。以物质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为例就可以充分印证了这一思想。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物质文化方面就有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丝绸、瓷器、茶叶等一些令世界震惊的杰作,它们飘洋过海,丰富着世界文明、影响着世界民族文化的形成。语言接触更是如此,比如汉语的外借问题。越南语、日语和朝鲜语在历史上,甚至直至今今天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字

的字形和读音,以至语言上把这三种语言中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成分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当然,伴随近现代西方文化而来的外来词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外来词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既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理论学术、哲学宗教,也包括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一句话,几乎囊括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

洛特曼一生研究范围极广,著述丰富。广泛的研究兴趣、宽广的学术视野、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巨大的研究能力和丰富的研究成果等一起构成了洛特曼学术生涯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赵睿晖:洛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1 期。
- [2] [俄]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3]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4] 郑文东: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5] 王铭玉、陈勇: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J],当代语言学 2004 年第 2 期。
- [6] Лотман Ю. Семiosфера [M], Изд. Искусст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0.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